

· 热点透视 ·

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

——兼论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
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张宏明

内容提要 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策储备”、90年代中期以来的“能量储备”，以及世纪之交的“规划发展”，中国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大国与非洲关系”中把握了战略先机，进而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大国在非洲关系”中，即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的攻防态势上赢得了某种程度的“战略主动”。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中排位的提升，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大国与非洲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也使得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不过，鉴于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系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之“副产品”，是“无心插柳”偶得之作；尤其是鉴于现阶段大国在非洲的整体力量结构依旧是“西强我弱”，随着近年来西方大国以“反恐维安”之名强化其在非洲军事布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自由度乃至战略空间或将受到挤压；加之，中非合作关系及中国对非战略的结构性缺憾，因此，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竞合”关系中并不占据战略优势，其“战略主动”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关键词 中非关系 西方大国 “攻防态势” “战略主动”

作者简介 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7）。

* 本文原本是“系列研究报告”之一：《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演化趋势》（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的一部分，因篇幅原因，单独成篇、拆分至此。是故，如欲全面了解笔者的观点，宜参照或结合上述“研究报告”阅读此文。

比较研究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与各大洲的交往中，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是最为顺畅和成效卓著的；同样，就洲际层面而言，在大国间的“竞合”关系中，唯有中国在非洲把握了战略先机，并藉此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是基于横向比较和纵向评估，而对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以及中国在其中处境的变化所做出的一种研判，同时也是对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一种动态处境的描述。那么，中国何以在新一轮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其表现形式是什么？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战略主动”？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凡此种种，也正是本文试图解析的问题。

如何辨析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竞争中的 “攻防态势”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在世界主要国家与非洲的关系中，更确切地说，在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西方在频频出招，中国疲于被动地应付。实则不然。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在新一轮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中国是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主要施动者并且处于相对主动的位置；而西方的招数多系针对中国加速“走进非洲”和强势在非洲存在的反制措施，即针对中国率先、主动在非洲活动的滞后、被动反应。

（一）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哪个层面赢得了“战略主动”

如欲对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以及中国在其间的实际处境做出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估，除了需要借助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等分属于不同层面的多重“关系”之间的传导、互动效应来加以解析之外，还需要对“大国在非洲关系”本身的不同层面进行分层解析和综合评估。确切地说，就是要在对大国在非洲不同层面的利益关系、力量结构或攻防态势进行分层研究的基础上，再行对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做出综合评估。

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不同层面，“自下而上”依次是：（1）处于基础部位的、在历史积淀和传承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大国与非洲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2）位居中间部位的、在过去 20

年特别是近10年，基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而形成的大国在非洲利益存在和攻防态势的变化；（3）处于表层部位的、随机或即时发生的大国围绕非洲或与非洲相关的某一特定事件的回合较量。

需要指出的是，大国在非洲上述3个层面的关系同样不是孤立或绝缘的；换言之，任何一个层面关系的变化都会传导到其他层面，进而引发所有层面的联动或共振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评估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的处境，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和评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竞争中的3个不同层面的处境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点需要澄清的是，“回合较量”与“攻防态势”之间的关联与区别。虽然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回合较量”与“攻防态势”，就其密度和程度而言，基本上都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5年；但前者指双方围绕某个非洲问题或在非洲围绕某个具体的“事件”或“议题”而展开的较量，计较的是一时一事的利弊得失；而后者指双方基于前期诸多因素的累积效应而在非洲的竞争或“博弈”^①中所处的主动或被动的“位置”变化，凸显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各自的攻防态势；这就如同围棋博弈中的“先手”^②与“后手”，讲求的是“取势”的重要性。

过去10年，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上述3个层面的处境，可以用“变与不变”来加以描述或概述。在“基础部位”也即力量结构层面，虽然就单一国家比较而言，中国的处境已经大有改观；但如果将“西方国家”视为一个“集合体”，则依然维系着“西强我弱”的力量格局。在“表层部位”的回合较量中，中国与西方可谓互有胜负；但鉴于回合较量的议题多为西方设置，加之其控制了国际话语权，因此中国也同样不占优势。比较而言，中国只是“中间部位”，即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大国在非洲“攻防态势”中赢得了“战略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强我弱”力量格局依旧的背景下，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已实属不易。

① 笔者之所以对“博弈”一词添加双引号，意在强调：就主观意愿而言，中国并未也不曾想同西方大国在非洲争斗，而是为了应对西方大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非理性反应，系不得已而为之。

② 在围棋棋理和术语中，“先手”是相对于“后手”而言的。所谓“先手”，就是你下了一手棋之后，迫使对方必须要应的一手棋，否则就会对整个棋局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先手”亦可谓是命令式。

（二）如何辨析大国在非洲“攻防态势”中的主动与被动

何为“战略主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主动需要同时具备下述双重能力或双重含义：其一指一国在国际交往、国际竞争或国际博弈中所具有的自主决断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其二指一国在国际交往，特别是国际竞争或国际博弈中具有影响、促使，甚或迫使他国做出相应反应的能力。

在国际竞争或国际博弈中，争取、掌握和维系战略主动是使己方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所在；而抢占或把握战略先机，则又是使本国在国际竞争或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进而获取战略主动的要件。唯其如是，在围棋对弈中，有时为了争取主动，甚至不惜付出高昂代价；围棋棋理中的“弃子争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足见争取和把握战略先机的重要性。所谓“先机制胜”，讲的是一种战术，即敢于并善于率先为人所未为，贵在先行一步；占据了先机，便有可能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打破固有的力量平衡关系，甚至在整体力量对比于己不利的情况下，赢得局部主动，进而改写对弈格局或竞争态势。具体到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或博弈，亦如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在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竞争中以弱搏强并赢得“战略主动”，原因就在于中国把握了战略先机。^①

那么，如何辨析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关系呢？笔者以为，与中非合作关系的迅猛发展一样，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或博弈中的“战略主动”也并非一蹴而就。虽然就表象或结果而言，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与博弈主要发生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后半段；但就中国而言，则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政策储备”和“能量储备”的累积过程，其时间跨度可以追溯到 20 年甚或 30 年。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就中国与西方大国双方行动的时序而言，是中国行动或发力在先，西方反应或应对在后。其大致序列是：由于中国主动、率先调整对非合作政策并率先、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先是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不适应并使之陷入被动；而西方大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各种反制措施，又导致中国的不适应；随之，中国又针对西方的反应进行回应或反击。如此循环往复，不一而足。但追根寻源，就 21 世纪，或者更宽泛一些说，在后冷战时期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中国是大国在非洲关系变化的主要施动者。

^① 当然，中国的战略先机确有“歪打正着”之嫌，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进一步展开。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引发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竞争并导致自身在非洲国际处境变化的“始作俑者”。

综上所述，如果说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系由大国与非洲关系（中非关系）的变化所致；那么，上述变化首先并且主要是由“中国因素”促发的，即是中国调整对非合作政策及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使然。只不过中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不自觉地，甚或是无意识地充当了这一角色而已。

（三）何以证明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握有“战略主动”

就大国在非洲的关系而言，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苏联和美国在冷战中后期基于地缘政治之争偶尔占据非洲舞台的中心位置、客串主角之外，法国、英国或葡萄牙等前殖民宗主国则在大部分时间担任大国在非洲的主角。但是进入 21 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且中国俨然成了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不仅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反应，而且可以牵制甚或调动其在非洲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大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旨在扭转自身不利处境的一系列“竞合”倡议特别是行动中得到印证或反证。

1. “中国因素”是促使西方加大对非关注和投入力度的致因。

冷战结束后，非洲因地缘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而备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冷落。事实上，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除了专注于在非洲推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之外，西方大国基本上对非洲采取“放任”态度，既不关注也不看好非洲，“非洲悲观论”的盛行便是这一冷漠态度的真实写照。

但是，进入新世纪，西方国家一改以往漠视非洲的态度，给予非洲以前所未有的关注。促使西方国家对非政策从战略忽视向战略关注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过比较而言，“中国因素”对西方大国的触动更大。中非合作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机制的有效运作，尤其是 2006 年北京峰会的召开，更加深了西方大国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简言之，正是由于“中国因素”的发酵，使得非洲这一被西方大国视为“失败的大陆”又重新进入其战略视野。^①

^① 详见张宏明：《西方与中国在非洲利益冲突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载《西亚非洲》2010 年第 7 期，第 6~11 页。

2. 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已经能够牵制或调动西方大国的行动。

国际影响与国际反应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又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西方大国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在2000年“论坛”启动后不久即有所显现，在2006年中非峰会后，其意图和行为愈加明显、露骨，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手法也更趋多样化。在此后的5年间，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愈益引起西方大国的“特别关照”；后者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也逐步从物质利益层面拓展到价值观念层面，乃至地缘政治层面；甚至一度形成了多管齐下、“集体反弹”的态势。^①

为了遏制或规约中国在非洲的“攻势”或活动，西方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关系除了竞争之外，亦在寻求就非洲问题与中国展开国际合作；这种局面同样是以往所不曾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的国际反响特别是国际反应之大。而中国在非洲的行动之所以能够牵制或调动西方大国，原因就在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传导作用，确切地说，就是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对大国在非洲固有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冲击。试想，如果中国在非洲活动的业绩平平，对于那些自视为非洲利益代言人的西方大国来说，不要说主动寻求与中国合作，甚至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都会不屑一顾。而西方大国之所以针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软硬兼施，其目的就在于，试图扭转自身的被动处境，以维系由其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的固有秩序。

（四）国人何故未意识到中国在非洲赢得了“战略主动”

或许是大国在非洲“西强我弱”实力对比的惯性思维使然，或许是对“大国与非洲关系”与“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因果关系产生了错觉，或许是混淆了大国在非洲3个不同层面的关系，抑或是将注意力聚焦于大国在“表层部位”的回合较量并忙于应付西方针对中国所施展的各种“反应”，国人似乎并未真正清醒地意识到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以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变化。而在上述致因中，或许最后一个因素所占的权重更大。过去10年，中国与西方大国已经围绕着后者设置的“议题”或挑起的“话题”进行了诸多回合的“争论”或“较量”。应当说，在“回合较量”中，双方互有胜负；但由于“议题”本身的原因，加之“回合较量”多系西方针对中国加大在非洲活动的反制行动；因此比较而言，还是西方处于攻势或主动居多。

^① 详见张宏明：前引文，第6~11页。

虽然“回合较量”的胜负不改大国在非洲“中方主动、西方被动”之攻防大势，然而却使国人对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判断上陷入了迷思。究其因，系由下述原因所致：

其一，正是在如此循环往复的“争论”或“较量”过程中，世人已经难辨公理，剩下的似乎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结果，在中非合作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被恶意放大或夸大，西方则运用其掌控的国际话语权肆意妄为、游刃有余，可以做到得理不让人，没理亦可搅三分；中国则是有理也讲不清。而这也正是西方所欲达到的效果。实际上，西方根本就不想同中国辩理，只是试图借助“国际舆论”或“国际规则”向中国施压，妖魔化中国，以牵制、干扰中国“走进非洲”战略的方式与节奏。对此，作为搅局者的西方人非常清醒，其目的性也很强；遗憾的是，反倒是国人被西方的伎俩所惑；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国人未曾意识到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握有“战略主动”，反而一味盲目地跟着西方的“反应而反应”的缘由所在。

其二，也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争论”或“较量”过程中，很多国人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设置的圈套，实际上，当国人认为西方挑起的“话题”是在无理取闹，并且针对西方的挑衅展开回应之时，就已经“不自觉”被牵着鼻子走了。其原因在于，西方设置的许多“话题”或“议题”本身就是陷阱，因为它们多系中国的短板。这意味着只要中国接招，便中招；有时甚至是越辩驳，越被动。而西方则可以在其精心设置的针对中国的“笔墨官司”中，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甚至还能够引起了部分非洲人的共鸣；而中国虽然“积极”应对，却依然被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道义、政治伦理或商业道德“缺失”的一方。

西方大国正是凭借不断设置“议题”、挑起“话题”，并通过“牵制与对话”等软硬兼施的手法，使中国疲于被动地应付，进而使自身在多数“回合较量”中占据上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变被动为主动的预期目的。遗憾的是，国人盲目地跟着西方设置的“话题”走，非但劳而无功，反倒使自己在“回合较量”中陷入被动的境地。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回合较量”不同于“攻防”大势，这是两个概念。换言之，西方在一时一事的“回合较量”中的春风得意，依然难以在整体上扭转其与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中的被动地位；这就如同中国虽然在非洲赢得了“战略主动”，但依然难改在大国在非洲“西强我弱”的力量结构一样。而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试想：如果我

们尚未意识到中国在非洲赢得了“战略主动”，又何谈把握战略先机、用好“先手”，以维系战略主动呢？这也是本文的写作动机所在。

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在全球化和多极化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大背景下，主要由“中国因素”所引发的“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及“大国战略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多重“关系”的互动，使得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呈现出诸多新变化；而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中国成为大国在非洲关系变化的施动者或主要角色，以及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便是这一变化的核心、焦点和阶段性结果。

（一）中国在非洲赢得“战略主动”的分析框架与求证途径

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在非洲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既是中国崛起在非洲的“逻辑延伸”，亦是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自然结果”。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迁等多重“关系”的视角，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传导、互动作用所引发的联动、共振效应来加以解析。^① 另则，中国在非洲赢得“战略主动”与中非合作关系迅猛发展是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同一政策过程的两个方面或两种正相关的结果。

1. 如何认知“不同层面多重关系的传导、互动效应”？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方面是凭借“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传导作用，确切地说，就是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对原有的大国在非洲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在这一时间跨度内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大国战略关系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总体相对比较平稳。^② 中国正是凭借自身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位的不断攀升以及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累积效应，

^① 作为首席研究员，这也是自 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对非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启动之后，笔者在工作中所尝试使用的一种“分析框架”或研究方法。

^② 笔者以为，虽然华盛顿对华奉行“接触”与“遏制”并行或交替的战略，但“遏制”战略并未对大国在非洲关系及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影响并改变着与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进而通过传导、联动或共振效应，从“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方向影响并改变着大国在非洲的力量结构，进而影响并改变着中国自身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当然，这种影响或变化的效果对中国而言是多重的，至少是双重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组属于不同层面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它们各自在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以及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更多的是在商业利益层面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构成影响；而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则主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地缘政治层面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构成影响；而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则又受到处于此长彼消中的大国综合国力及其利益诉求动态变化的影响。

2. 如何理解“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或两种结果”？

中非合作关系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迅猛发展与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实则这两者是有关联性的。一方面，它们是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同一政策过程的两个方面或两种正相关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两者本身也是一种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确切地说，是中非关系变化触发了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处境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非合作关系迅猛发展的过程也即是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过程；因此，解析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以上论述旨在为解析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提供一种分析框架与求证途径；实际情况或过程要复杂得多。事实上，促成中非合作关系迅猛发展，进而使得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是中国自身积极作为的结果或回报，也与西方大国对非政策的取向，以及对中非关系发展的“判断失误”不无关系。

（二）中国在非洲赢得“战略主动”的内部因素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在探究中非合作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或论调，即认为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仿佛是一蹴而就；国人在解析其中的原委时，亦往往言必“中非合作论坛”。诚然，就时间跨度而言，

中非合作的迅猛发展确系发生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中非合作能有今日之辉煌成就，“论坛”机制的适时启动及其富有成效的运作也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均不为过；但是亦并非其独为也，如果没有前期的“政策储备”和“能量储备”，中非合作同样就难有后来如此顺畅、快捷的发展。系统研究的结果亦证实，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对非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始于 90 年代中期的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等举措，在其间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① 原因在于，中非关系迅猛发展的“原动力”并非始于 2000 年“论坛”机制的启动，而系多重因素互动和政策累积效应使然。

如同中非合作关系的迅猛发展经历了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一样，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变化，更确切地说，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在非洲的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亦非朝夕之功，而系跨世纪不懈努力之结果，其时间跨度可以延展到 20 年，甚或 30 年。唯其如是，笔者以为，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但是探究导致这一变化的诱因则需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甚或 80 年代。可以说，就大国与非洲关系而言，如果中国没有两次“率先行动”，中非合作关系就不会有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跨越式发展，更难以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1. 得益于中国对非政策的率先调整或“政策储备”。

就各大国在冷战终结前后的非洲政策比较而言，站在政策连续性的视角，中国是最早做出政策调整的国家。与西方大国在冷战终结之后调整其非洲政策不同；随着国际处境的改善，特别是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政府率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非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② 其结果，中国对非政策在冷战终结前后保持了连续性，基本上未受到冷战终结因素的影响；而西方大国的非洲政策则在冷战终结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

作为一种“伴随战略”^③，中国对非政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调整是伴

^① 详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合作政策的传承、内涵与效果》，载杨立华主编：《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6~93 页。

^②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对非合作政策调整的时间、背景、内涵、成效及其“新政”所受到的干扰等，详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合作政策的传承、内涵与效果》，载杨立华主编：前引书，第 33~46 页。

^③ “伴随战略”是笔者对“中国非洲战略”的一种描述或称谓。从“系统”的观点来说，中国的外交和发展战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非战略是作为中国外交和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论及，恕不赘述。

随中国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的调整而发生变化的。中国对非政策的“去意识形态化”及“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①（以下简称“四项原则”）的出台，便是政策调整的重要标志或结果。较之此前，虽然中国对非政策的原则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中非合作的内涵，特别是政策目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中国对非政策的着力点逐步由以往单纯的“政治导向”向政治、经济并重，经济合作则由以援助为主向互利合作倾斜，这种趋势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更趋明朗。

诚然，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较之政治层面的调整，中国对非政策在经济层面的“新政”，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真正、全面、有效地付诸实施，其正面效应亦未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充分的释放。但是，无论是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还是站在发展的视角，其重要性和意义均不可低估：它不仅为日后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先期做好了“政策储备”；尤为重要的是，它奠定了跨世纪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基调，预示并引领着中非合作关系跨世纪的发展方向。比较研究的结果亦显示，虽然在1983年之后，中国政府就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又陆续出台了許多新倡议、新举措，内容愈加丰富，但其核心内容并未超出“四项原则”的范畴。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策调整做铺垫，中国政府在日后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就不会那么顺畅与迅捷。这也是笔者倾向于将中国政府此次政策调整称之为“政策储备”的缘由所在。

2. 得益于中国率先加大对非工作力度或“能量储备”。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策调整为日后的中非合作提供了“政策储备”，那么，中国政府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努力，则在跨世纪中非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之积蓄了足够的能量。^②原因在于，20世纪最后5年不仅是中国全面践行对非合作“四项原则”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对非合作政策的充实、提速的蓄势阶段。事实上，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竞争”也正是因为中国主动、率先加大对非工作力度而招致西方大国的“被动”、滞后反应而引发的。

虽然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是基于多方面考虑（下文将展开），但促进中

^① 其内容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② 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背景、内涵、成效等内容，详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合作政策的传承、内涵与效果》，载杨立华主编：前引书，第46~64页。

非经济合作发展无疑是其中的工作重点之一。原因在于，进入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发展的提速，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逐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面向发达国家，转而同时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者旨在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海外资源和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对非洲有了新的战略需求，即由此前相对单一的外交或政治需求，拓展到政治、经济双重需求。换言之，非洲在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中均有了定位，这预示着经济合作不再仅仅满足于充当配合外交的政策工具，而且成为中国对非政策所追寻的重要目标。

唯其如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识地重视中非合作关系，并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加大了对非工作力度。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领导人高密度访问非洲，政府职能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中非经贸合作的政策、措施，并就促进中非经贸合作所做出的一系列具体的组织部署。^①也正是由于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业已成为满足国家发展需求的一种战略选择，因而它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努力，则又为中非合作关系跨世纪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辛勤耕耘，中非合作就不会有 21 世纪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更难在“西强我弱”力量格局依旧的背景下，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3. 得益于“论坛”机制的启动及其富有成效的运作。

世纪之交，根据国际环境、非洲形势的变化及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契合“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中国政府就提升中非合作的战略层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和举措。其标志性事件是 2000 年正式启动中非合作论坛。^②自“论坛”机制启动后，经贸合作逐步成为中非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并且日益紧密地融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中。至此，非洲不仅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之重要

^① 关于这一点，笔者有切身感受。笔者在 1991 年至 1993 年，1995 年至 1998 年先后在中国驻几内亚和贝宁使馆调研室工作：前一任期的工作主要局限于跟踪驻在国的政情；但在后一任期，不仅经商处，而且使馆本部调研室也受命研究驻在国的经济形势及经贸合作事宜。

^② 关于“论坛”机制启动的背景、出台的举措及其运行的成效等方面的内容，详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合作政策的传承、内涵与效果》，载杨立华主编：前引书，第 64~93 页。

合作区域，而且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经济安全之大局。^①

可以说，“论坛”机制启动后，非洲不仅被中国决策层更加有意识地被纳入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中，而且在其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论坛”机制在中非合作中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建立中非合作的长效机制，将中非关系尤其是中非经贸合作纳入机制化或规划发展之轨道。^②“论坛”机制启动后的短短10多年时间，是中国对非合作政策、措施出台最为密集、推进力度最为强劲的时期。这些政策、措施几乎涉及中非关系的方方面面及中非合作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透过对中国政府在历届“论坛”会议上提出的政策、措施的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论坛”机制在创新合作方式、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领域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关于“论坛”机制在促进中非关系，特别是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已为日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所证实，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均不为过。而“论坛”机制有效运作的过程，既是中非合作关系迅猛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过程，两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综上所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主要凭借的是中非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关系的跨越式发展；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的两次“率先行动”，则使中国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发展中两次占得先机，并为“论坛”机制启动后中非合作关系的“规划发展”做了有益的铺垫。因此，就内部因素的重要性而言，很难在“政策储备”、“能量储备”和“规划发展”之间区分伯仲。原因在于，它们不仅在中非合作关系发展的特定时期发挥了各自的独特作用，并且共同构成了这一发展进程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因素链”。

（三）中国在非洲赢得“战略主动”的外部环境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中获取“战略主动”，除了内部因素的作用之外，亦离不开外部环境的“配合”。比较研究显示，在冷战终

^① 关于非洲在中国外交和发展战略中地位和作用，详见张宏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思路》，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② 此后，中国政府依托“论坛”机制，与非洲国家一道，以“宣言”特别是“行动计划”的形式对中非各领域关系特别是中非经贸合作做出三年发展规划；并借助“论坛”平台及其后续行动机制，根据形势变化和双方的实际需求，不断推出新政策和新举措。

结后的最初 10 年抑或 15 年，西方大国与中国在对非洲形势发展的判断、工作重心、投入力度、政策目标，乃至重视程度、工作力度、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①也正是由于上述差异，使得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各有斩获、各得其所。

1. 西方大国与中国在对非洲形势判断方面的差异

冷战终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际格局的重组，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大国与非洲的关系，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其中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变化便反映在大国对非洲形势的判断上，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大国在对待非洲国家态度的变化上。冷战终结因素使得非洲作为“欧洲侧翼”安全的地缘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使非洲国家失去了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加之，随着西方国家利益重心的转移，非洲备受国际社会的冷落。

而当时非洲形势也的确不容乐观。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失去的 10 年”之后，进入 90 年代，非洲又在整个大陆层级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骚乱的窘境；致使“非洲悲观论”在国际社会弥漫，这种悲观情绪几乎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当人们提及非洲时，往往与战乱、饥饿、贫穷、难民、艾滋病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这无疑也是导致西方大国对非合作踌躇不前的重要因素。

然而，就是在西方大国不看好非洲前景的情况下；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与西方国家漠视、冷待非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非洲的未来特别是发展前景充满希望。1996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满怀激情地讲道：过去的 100 年作为非洲的“解放世纪”已载入了史册，未来的 100 年将会成为非洲的“发展世纪”而写入新的历史篇章；中国与非洲不仅“有着绚丽多彩的今天”，而且“还将拥有生机盎然的明天”。^②

2. 西方大国与中国在对非政策着力点方面的差异

西方大国与中国不仅在对非洲的形势判断和重视程度等方面存有明显差异，各自在非洲的利益关切、工作重心和政策目标亦可谓南辕北辙。简而言之，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 10 年，特别是 90 年代上半叶，西方对非洲关注和

^① 详见张宏明主编：《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版，第 555 ~ 574 页。

^② 江泽民：《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载《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14 日。

工作的重点不在经济或民生领域，而系政治变革或制度建设层面。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将经济援助与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挂钩，只是各国对非洲施压促变的强度与手法不同而已。^①与西方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非政策可谓是政治、经济并重，但着力点逐步在向经贸合作过渡，当然后者是一个渐进和持续的过程。即便是在政治层面，中国的工作重点和政策目标亦有别于西方，其要旨是通过维系或加强政治互信来稳定国家关系。

进入90年代中期，西方大国在非洲推行其政经模式取得初步成效后，其对非政策虽然有所调整，但其政策取向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是逐步把工作重心转向维系和巩固“西化成果”，诸如完善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等。诚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及非洲经济的复苏，个别西方大国又对其非洲政策做出调整，逐步从政治优先转向政治和经济并重，但其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要远远低于中国。

3. 西方大国的傲慢态度以及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忽视

在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头15年中，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之所以未遇到强大的国际阻力，与当时西方大国对待中国、非洲、中非关系的判断，以及当时大国在非洲特定的关系是不无关系的。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与西方大国在发展对非关系上基本上依然是各走各的路，互相之间也少有关注，只不过各自对非工作的重心和用力不一而已。实际上，西方大国对中非关系的关注度经历了一个从漠视、注视到正视的演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亦与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反应度，即从“感性”到“理性”的演化过程是基本相吻合的。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西方大国对中非关系走势的判断，其一，在20世纪的最后5年和21世纪的头5年，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预期也远不如此后那么强烈与焦虑，因而也就不甚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其二，西方国家在非洲占据战略优势，它们在非洲推行西方政经模式得手后，对继续掌控非洲局势信心满满；其三，当时大国在非洲的争斗主要发生在法国与美国之间，双方时有摩擦，无暇顾及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遮蔽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其四，截至21世纪头5年，西方大国并未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做出过激的反应，关于这一点，亦可从此后其对中非关系的反应度的急剧变化中得到反证。然而，当西方大国警醒过来，中国在非洲已然得“势”。

^① 详见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6页。

比较 20 世纪最后 10 年西方大国与中国在对非政策方面的变化或差异，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得益于率先做出政策调整，中国对非政策在冷战终结前后保持了相对连续性，而西方国家则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二，中国对非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步淡化、消失，而西方国家对非政策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反而愈加浓重；其三，非洲在西方国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呈下降趋势，而在中国外交战略特别是发展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则越来越重要；其四，西方国家在对非投资、援助方面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甚或退缩的状态，而中国则逐步提升了中非合作的战略层级并持续加大了对非经贸工作的力度，等等。在 21 世纪的头 5 年，西方大国与中国对非政策的取向或特点则可以分别用“安全导向”和“发展导向”来加以概述。

上述差异或特征使得西方大国与中国各有斩获、各有所得：中国维系了在非洲的“外交阵地”，稳固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础”，并实现了中非经贸合作跨世纪的大发展；而西方则在推销其政经模式、价值观念^①，及强化在非军事存在方面收获颇丰。两相比较，凸显了中国对非政策的进取性和务实性。虽然目前就西方大国与中国对非政策的孰是孰非下结论尚为时过早，因为各自所追寻的政策目标不同，加之，有些在即期便可凸显，而有些则需长期方得以显现。不过，至少截至目前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取向或特点的比较中，中国似乎更加注重即期可以兑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差异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亦有所反映：这或许是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不仅取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且也是得以在力量对比并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赢得“战略主动”的原因所在。

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战略主动”

上文解析了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那么，应该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或评估这种“战略主动”？它使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特别是中国在其间处境的走势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对于上述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其一，中国在非

^①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基本完成政治制度的转轨和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安排；民主化进程比较顺利地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向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过渡；以及非洲人对民主、人权、良政等西方政治模式或价值观念的认同度中得到印证。

洲的“战略主动”虽然就国别而言改变了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利益或力量存在中的排序,但并未改变“西强我弱”这一固有的整体力量结构;其二,大国在非洲“攻防态势”的变化对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在增强中国在非洲国际地位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阻力;其三,鉴于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是不经意得手的,加之中国的“非洲战略”或中非合作关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憾,这一“战略主动”只是阶段性、局部性的,并且不具可持续性。^①

(一)为什么说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是不经意得手的

用“误打误撞”或“歪打正着”来形容或描述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把握了战略先机,进而赢得了“战略主动”,确实有失公允。比较客观或中肯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不是基于一种前期的战略谋划,有意识、有目的或刻意地争得的;而系借助政策和资本的力量,率先、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之“副产品”。站在更宏观的视角,亦可视为大国综合实力排序变化在非洲的反应,抑或是中国快速崛起在非洲的“逻辑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只是“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大国综合实力变化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传导、互动和共振效应所致;系“无心插柳”之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原因还在于,中国率先调整政策和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首先并且主要是基于自身需求的变化或中非双方的需求考虑,而非基于大国在非洲关系特别是竞争的考量;实际上,中国亦不曾想与其他大国在非洲进行较量。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下述行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反差中得到印证。

1. 中国率先调整对非政策主要是基于工作重心转移之考虑。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虽然受到了国际、国内、中非关系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工作重心转移,特别是基于缓解援外资金与国内建设资金间矛盾之考虑。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面向所有国家,不过,在最初的十几年间,鉴于国内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基于轻重缓急特别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之考虑;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目的旨在获取国内经济发展亟须的资金和技术。坦率地讲,在当

^① 鉴于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笔者在《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演化趋势》一文中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本文着重解答第三个问题。文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

时特定的条件下，非洲尚未被纳入中国发展战略之中，中国一时也顾及不上非洲。由此可见，中国在对非政策的率先调整虽然是一种“主动”行为，但却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集中财力搞好国内建设。因此，站在历史的视角，此次对非政策调整，不在开拓进取，而系权宜之计，旨在稳住中非关系。事实上，当时中国总理出访非洲 11 国亦有向非洲国家领导人“说明情况”以求得其谅解之意。^①

2. 中国率先加大工作力度是基于外交斗争和深化开放的需要。

较之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政策调整，中国在 90 年代中期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动因和目的虽然更为复杂、多样，但着眼点依然是为了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用当时中国官方话说：做好对非工作旨在满足“3 种需要”：其一是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的需要；其二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三是遏制“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巩固外交阵地的需要。由此可见，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并不像一些西方政要、学者和媒体所渲染或解读的那样，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样也是基于中国在政治、外交方面对非洲的需求。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② 因而对非洲的需求是多方面。至少在 90 年代，中国对非洲的政治、经济需求是同等重要的，在特定的年份，政治需求甚至还要大于经济需求。这一方面是基于争取非洲国际支持、赢得外交斗争的考虑；^③ 同时，也是基于遏制“台湾当局”“务实外交”、巩固外交阵地的需要。^④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如同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非合作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先行一步，进而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把握了战略先机是不经意之举一样；中国在 90 年代中期加大对非工作力度，除了

① 关于这一点，亦可从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中得到印证。邓小平就曾对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讲得十分坦率，大意是：现阶段中国需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中国富强了可以更好地支援非洲国家。

② 张宏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思路》，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7 页。

③ 从 1990 年起，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提案，企图利用人权问题妖魔化中国。为了冲破国际孤立及赢得国际人权斗争的胜利，中国亟须获取国际支持；在这一背景下，非洲作为中国传统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支持力量的作用开始显现。

④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对非经济援助的减少，恰逢非洲经济形势恶化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致使“两岸”在非洲的外交争夺逐步趋于白热化，进而导致一些非洲国家与中国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当时非洲与“台湾当局”建交国的数量虽然位列拉美之后，但却是两岸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

在经济层面确有一些长远考虑之外，余者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应急策略。从结果来看，在整个 90 年代，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政治效益要明显大于经济成效：当时非洲在中国多边外交中的作用已然凸显。事实上，也正是仰仗多数非洲国家的国际支持，中国才得以一次次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及西方鼓噪的人权反华提案；而非洲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中非经贸合作的潜能均尚未得到充分显现或有效释放。

3. 启动“论坛”机制是基于中国外交特别是发展战略之考虑。

笔者始终以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启动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加大对非工作力度这一政策指向的延续，只是进入 21 世纪后其政策的力度更大，涉及的领域更广，规划性、目的性更强。然而，中国启动“论坛”机制的出发点和动机非常实际，也非常简单：同样主要是基于自身外交和发展战略之考虑，及适应中非关系发展的需要；换言之，是基于“中国与非洲关系”之考虑，而非基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关系”之考虑。正如近年来随着中非合作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反响的增大，官方所反复解释、申明的：中国发展对非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甚至对后者持开放态度。至于“论坛”机制的启动及其有效运作会对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和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产生什么影响、带来何种变化，至少截至 21 世纪的头 5 年，或许都不曾认真的考虑过。然而，影响历史进程的，不是主观愿望，而系客观结果。

（二）为什么说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不具备可持续性

就已知的确定性因素及可以预知的变量因素来看，在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余下的年份里，无论是中国在非洲的发展环境，还是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都将呈现出比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更为复杂的变化。^① 具体到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亦如是。之所以说，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主动”不具备可持续性，甚或存在得而复失之虞，除了上文提及的原因外，原因还在于：

1. 中国的“非洲战略”或中非合作关系本身存在着结构性缺陷。

毋庸讳言，中非合作关系在 21 世纪的迅猛发展，就成果而言主要反映在经济层面。同样，中国得以在新一轮大国在非洲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就

^① 关于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变化及其在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演化趋势，参见张宏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思路》，文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另见张宏明：《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演化趋势》，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32 页。

内部因素而言主要凭借的也是政策的效力、经济的推力和资本的作用，确切地说，是中国在经贸合作层面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之结果。这一政策取向的“持续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且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得到进一步强化。就政策目标而言，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过，这种政策取向也带来诸多的弊端，其中之一便是使中非合作各领域发展陷入了“结构性”失衡。

关于中国的“非洲战略”、中非合作关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或中国对非工作要有全局观并注重整体性以促进中非关系的协同发展的观点，笔者在2006年即已提出，此后，笔者又在多篇研究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原因在于，中国对非合作的各个领域是一个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应站在我国对非政策，乃至外交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通盘考虑；然而，现实却差强人意。

中非合作关系的结构性缺陷反映在政策（或战略）和操作（或实践）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中国的“非洲战略”目前依旧停留在“伴随战略”这样一个低水平上。正是鉴于中国的“非洲战略”及中国对非合作政策本身缺乏顶层设计、全局统筹、整体规划，加之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实际部门缺乏应有的相互配合、协同行动；因而就实际运作或实施效果而言，中非合作各领域发展“结构性失衡”的隐患和弊端已然显现；突出反映在，较之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中非在人文和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对滞后。^①这种“结构性失衡”引发了中非合作层面的一系列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既缺乏安全方面的“硬保障”，亦少有人文方面的“软支撑”，致使一枝独秀的中国对非经贸合作呈现出孤军深入的窘态。^②虽然这种“结构性缺陷”在2006年前后便引起中方的注意，并在政策层面做出调整，但由于惯性使然，要想真正扭转尚需假以时日。

2. 西方“重新布局”或将使中国在非战略空间受到挤压。

从外部环境的变化来看，首先，西方在大国在非洲的力量结构中占据战略优势。从趋势上看，中国在非洲主要利益攸关方仍将是西方大国。而西方

^① 张宏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思路》，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6页。

^② 张宏明：《中非政治互信在价值层面互动所面临的困局与破解思路》，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国家既是一个个有着自身独特利益的单一国家，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又可能形成以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为首的大小或“形态”不同的“国家集团”。毕竟基于“共同的”利益或价值观，西方大国之间在政策协调、行为规范等方面相对来说更容易些；而中国则难以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或博弈中寻觅到真正的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时及可以预期的相当长时期内，大国在非洲的力量结构仍将维系“西强我弱”的格局。

另则，西方大国在非洲加大了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①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随着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适应度的提升，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看似逐步趋于平静；但实际上是暗流涌动，各自都在暗中角力。为抢占全球工业化进程最后的“盛宴”，西方大国纷纷加紧在非洲的布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法国、英国等国以反恐为名不断强化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此举现时或许确系反恐维安之需，但是否也隐含着防范中国之意，尚有待观察。因为，一旦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恶化，这些军事部署极易转化为遏制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工具。即便就目前而言，西方大国此举在凸显中非关系结构性缺陷的同时，也将使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

此外，西方对非政策取向的“后发效应”或将逐步显现。由于西方大国与中国对非政策的取向不同，各自政策目标所需的“收获期”亦各异。比较而言，中国在促进中非经济合作发展方面的作为的成效已然显现；而西方大国在推进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努力，其效益仍尚未充分发酵。因此，目前来判别中国与西方大国对非政策的孰优孰劣，尚为时过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在非洲的作为，看似华而不实，实则意在长远。当然，其效益是否会长期、持续发酵，尚有待观察。

概言之，鉴于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仍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因此笔者始终以为，不宜用好与坏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简单方式来对之加以评估或描述。同样，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的“主动”与“被动”也是相对而言的，并且在适宜的条件下，两者还可以发生相互转换。唯其如是，任何有关大国在非洲攻防态势及中国在其间处境走势的研判，都必须附加特定的时空背景或相关条件。

^① 如果说西方大国对非政策的取向以及盲目自信是中国得以在非洲赢得“战略主动”的原因之一，那么，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后 5 年，西方大国无论是对待非洲还是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How to View Dialectically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China in Africa

——On How China Has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New
Round of Competition between Big Powers in Africa

Zhang Hongming

Abstract: China seized its strategic advantage in the big power’s relations with Afric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has won, to some extent,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in Africa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i. e. , in the new round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posture between big powers in Africa, which benefits from the policy reserve in early 1980s, the “energy reserve” since the mid – 1990s and the development programm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anking of China in the interest presence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big powers in Africa have not only improved China’s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and Africa, but put China in a more favorable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Africa. However, since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of China in Africa is a “by – product”, or an “accidental product”, of China’s continual reinforcement of the work on Africa, especially since the actual overall power structure of the big powers in Africa is still at the stage of “West strong and East weak”, since the freedom of activities and strategic space of China in Africa will be squeezed with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Western military presence in Africa in recent years in the name of “antiterrorism and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ince the structural defects i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ve relations and China’s strategy towards Africa, China does not possess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g powers and Africa, and China’s “strategic initiative” may not be sustainable.

Key Words: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Strategic Initiative”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